

世 界 思 想 家 译 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ARENDT  
阿伦特

[美] 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 著  
PATRICIA ALTENBERND JOHNS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On Arendt*, ISBN 0-534-58361-X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伦特/(美)约翰逊著;王永生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6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101-04963-X

I. 阿… II. ①约…②王… III. 阿伦特, H. (1906—1975)

—哲学思想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894 号

- 
- |       |   |
|-------|---|
| 书 名   | 阿伦特   |
| 丛 书 名 | 世界思想家译丛   |
| 主 编   | 张世英 赵敦华   |
| 著 者   | (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  |
| 译 者   | 王永生   |
| 责任编辑  | 李丽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br>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80×1230 毫米 1/32<br>印张 4 $\frac{1}{8}$ 字数 9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963-X/B·423  |
| 定 价   | 8.00 元  |
-

## 《世界思想家译丛》

### 第一辑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奥古斯丁  
阿奎那  
霍布斯  
笛卡尔  
斯宾洛莎  
洛克  
莱布尼茨  
休谟  
卢梭  
康德  
黑格尔  
叔本华  
梭罗  
马克思  
尼采  
弗洛伊德  
胡塞尔  
杜威  
怀特海  
罗素  
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  
萨特  
波伏瓦  
加缪  
福柯  
哈贝马斯

### 第二辑

伊壁鸠鲁  
帕斯卡尔  
贝克莱  
密尔  
克尔恺廓尔  
陀斯妥耶夫斯基  
皮尔士  
荣格  
伽达默尔  
波普  
阿伦特  
梅洛-庞蒂  
蒯因  
德里达  
罗蒂

# 目 录

1. 出世与去世之间.....	1
2. 极权主义 .....	25
3. 人类的境况 .....	40
4. 艾希曼 .....	59
5. 面对黑暗的时代 .....	74
6. 反思美国的经验 .....	89
7. 思考的意义.....	101
8. 阿伦特与当代思想.....	112
生平及著作年表.....	119
参考书目.....	121

# 1

## 出世与去世之间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26年7月给她的导师兼友人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信中写道：“我试图通过经由我本人的经历所获致的视角来阐释历史，来理解其中所表达的东西。”(Letter 1)她的经历使得她确信，尽管人皆有死，但每个人都从出生开始。在《人类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她这样写道：

设若任其自然，人类的事务惟有遵循必死律——在出生与去世之间度过的一段生命中最为确定且惟一可靠的定律。正是行动的功能干涉了这一定律……(246)

行动的这种功能使得人类得以打断自己的生活，并且开始新的筹划。借助这一洞见的视角对生活展开的阐释，为阿伦特提供了在黑暗时代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在新的情况下和新的天地里重新开始她的生活的能力。

## 在德国开始生活

汉娜·阿伦特生于1906年10月14日。她的父母——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和玛尔塔·阿伦特(Martha Arendt)——为她取名约翰娜,但她后来一直只是以汉娜一名为世人所知。尽管生于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她却在小小年纪就经历了深深的痛苦和不幸。

### 哥尼斯堡

阿伦特夫妇都出身于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站稳脚跟的犹太家族。在汉娜三岁的时候,由于父亲身患梅毒,全家搬回了哥尼斯堡。他在1911年被送往医院进行医治,并于1913年辞世。汉娜的祖父——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亦于同年去世。1914年8月,玛尔塔·阿伦特携汉娜逃往柏林,以躲避俄国入侵的威胁。然而,她们当年就得以重返哥尼斯堡,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玛尔塔·阿伦特招租房客,并且倚赖她的家族经济上的支援。汉娜遭遇了一段时期的疾病的困扰,这很可能是由于她的父亲和祖父的骤然死亡所导致的。然而,她最终得以在学校里安顿下来。学习和思考所带来的挑战,为她提供了对于“开始的力量”的最初体验。她的健康状况改善了,并且开始茁壮成长。

汉娜还在她生命的这一阶段初次体会了政治的重要性。玛尔塔·阿伦特把她的家向社会民主主义者敞开了大门,并且加入了一个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团体。尽管一般而言,她

反对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s)——该同盟系由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组织,但她却是卢森堡本人的一个崇拜者。在1919年,她支持由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所领导的大罢工。伊丽莎白·扬-布鲁厄尔——汉娜·阿伦特的最为详尽的传记的作者——记述说,玛尔塔让她的女儿记住,她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28)。尽管革命最后失败了,玛尔塔·阿伦特仍然继续她对德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参与。

1920年2月,玛尔塔·阿伦特嫁给了马丁·贝尔瓦尔德(Martin Beerwald),一个带有两个女儿——爱娃(Eva)和克拉拉(Clara)——的鳏夫。玛尔塔和汉娜搬进了贝尔瓦尔德家,两个家庭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然而,汉娜从来没有真正地认同这个整体,她通常更乐于自行其是。她开始吸烟——这一习惯后来伴随她一生,并且创立了一个“希腊学圈”(Greek Circle)。她和朋友们一起在她于贝尔瓦尔德家中的房间里阅读和讨论古希腊经典。她开始钻研克尔恺廓尔(Kierkegaard)和康德(Kant)的著作,并且借写诗来抒发她在情感上的模棱与彷徨。在一首题为《厌倦》(Weariness)的诗中,她写道:

我所爱的  
无法把握。  
环绕我的  
无从摆脱。

黑暗弥漫  
万物消隐。

没什么能把我征服——

此乃生活的真面目。(扬·布鲁厄尔 17)

她的智性成长正在开始,1924 至 1929 年间在大学度过的岁月,为她提供了跟随 20 世纪最令人激奋的一些学者学习的机会。

### 求学经历

18 岁时,汉娜·阿伦特就读于马堡大学,跟随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以及哲学家尼古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海德格尔当时正处于酝酿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的时期。阿伦特参加了他的讲座,并且被海德格尔开辟的激动人心的新的哲学路径深深地影响。尽管她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同海德格尔的分道扬镳,但是她的思想在根本上被她在马堡的这段求学经历所塑造。

当阿伦特到达马堡的时候,海德格尔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并且已经 35 岁了。他在获得一个大学教席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并且刚刚开始建立起他在哲学界的声誉。阿伦特既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所折服,又被他作为一个成熟男人的风度所吸引。海德格尔冒着失去他的职位和婚姻的危险采取主动,开始了一段风流韵事。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段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遂于 1925 年将其终止,尽管此后阿伦特又继续保持了数年同海德格尔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二战结束后重又恢复了与他的友好关系。在友谊重新恢复时,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她是他许多思想的灵感之源。可是在 1925 年,他们心照不宣地就这段恋情达成默契,她离开了马堡,首先在弗莱



堡，继而在海德堡继续她的学业。

在海德堡，她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她此后的生活中一直是她的导师和朋友。同海德格尔一样，雅斯贝尔斯也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他是从心理学半路出家投身于哲学的，相比海德格尔，他对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更为关注。他对阿伦特智性上的影响显然不如海德格尔，但是他以身作则为她示范了一种生活方式。阿伦特后来意识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以沉思为其特点的。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ove in Augustine*)。

在这一时期，她重新加强并深化了同汉斯·约拿斯(Hans Jonas)——她在马堡结识的一位同窗——的友谊。这一友谊——就像同雅斯贝尔斯的一样——持续了她后来的整个一生。她还密切了与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的关系，她在马堡期间就与之相识。他们很快开始同居，并于1929年9月成婚。斯特恩帮她编辑整理了博士论文的定稿，完成后，他们搬往法兰克福，以便斯特恩能够着手获得他的任教资格(Habilitation)的预备工作。在德国的学术体系中，这项工作包括进行任教资格演讲和提交学术论文，这些都是获得一项大学教职任职的初始程序。

### 在法兰克福的经历以及迁往柏林

斯特恩正致力于一项音乐哲学方面的课题，由于法兰克福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团体日益增长的声望，他希望能够到那里任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当时也在法兰克福，斯特恩和阿伦特都参加了他的讲座。就在同

一时期，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就是后来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The Frankfurt School) 的前身。尽管斯特恩和阿伦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是同这些思想家进行了哲学上的交流，阿伦特开始对政治问题越来越感兴趣。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赛 (Herbert Marcuse) 和特奥多尔·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当斯特恩递交他关于音乐哲学的论文时，阿多诺作为同一领域的研究者和论文的最初读者，枪毙了它。

其间，纳粹的势力正在日益增长，斯特恩意识到了大学中的反犹太主义思潮，加之他的论文被驳回，使得他获得一个教职在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他和阿伦特决定迁往柏林。在那里，斯特恩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并化了一个笔名——君特·安德斯，他在后来的整个写作生涯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在柏林，阿伦特开始写作一部拉赫尔·法恩哈根 (Rahel Varnhagen) 的传记，并且恢复了同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 (Kurt Blumenfeld) 的交往。布鲁门菲尔德曾是她祖父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Zionist)。这两件事都使得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en) 这部传记直到 1958 年才得以出版，但是它的大部分在 1932 至 1933 年间就已在柏林完成。法恩哈根，原名拉赫尔·莱文 (Rahel Levin)，生于 1771 年，出身于柏林一个上流犹太人家庭。在青年时期，她就自己家中的阁楼里举办知识分子沙龙。在拿破仑战争结

束以及反犹主义兴起之后，她改信基督教，并且嫁给了奥古斯特·法恩哈根（August Varnhagen）。后者是一名基督徒，在年纪上比她小很多。拉赫尔·法恩哈根坚持记日记，并且写回忆信，这些书信揭示了她关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内心挣扎。最终，她认同了自己的这一身份。

阿伦特对法恩哈根生活的记述和解释，被许多人既当作一部传记又当作一部自传来读。她利用这部书的写作，与自己在反犹主义重又威胁德国犹太人的时刻作为一名犹太人的身份相挣扎。受布鲁门菲尔德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阿伦特并非仅仅简单地在写一部传记，她在其中糅入了对于同时拥有一个德国身份和一个犹太身份的模棱特质的反思。在1933年1月的一段为期6天的日子里，阿伦特同雅斯贝尔斯就此问题进行了通信讨论。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她认为对于她而言，做一名德国人只意味着讲德语及阅读德文哲学和文学著作。他在回信中写道：“这种明显带有德国特征的伎俩是多么地滑头啊！你由于自己是一名犹太人而企图与有关德国的一切划清界限，我觉得这有些怪怪的。”（信件123）他向她建议，她有必要为自己对于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加上一个政治和历史的宿命色彩。她对此的答复发人深省。她在反犹主义和日益高涨的犹太复国主义背景下写就的关于法恩哈根的这本著作，已经使得她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了重要的深切认识。她是这样回复雅斯贝尔斯的：

我当然是一个我在前面所讲的那种意义上的德国人。但是我不能简单地加一个德国的政治和历史的宿命在上面。犹太人此前对此命运的参与是多么地迟，多么地残缺不全，由此他们进入一段陌生的历史是多么地偶

然,对此我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我身上的德国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因为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助长对真正的处境问题的模糊。(信件 24)

阿伦特没有加入她所列举的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法恩哈根一样,她决定做一个被她称作“有意识的贱民”的人。她将不会被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地恪守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

在他们逗留柏林的这段期间,阿伦特与斯特恩的关系开始疏远。她不再同他交流自己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坦率地同布鲁门菲尔德这些人分享自己的心得。1933年2月国会纵火案之后,斯特恩得知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左派同情者的通讯录中,而此人很可能已经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于是他决计离开德国,而阿伦特则选择继续留在柏林,同布鲁门菲尔德一起工作。

由于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名成员,她得以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做有关反犹主义的研究工作。她还在她的家里为正在逃离德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提供庇护。然而,她后来因此被捕,并被拘押审讯达8天之久。她和她的母亲——她当时与她住在一起——断定,到她们进行逃离的时候了。借助一间安全的屋子——这间屋子从前门德国接纳逃离者,并通过后门使他们遁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非法穿越捷克边境,她们离开了德国。

## 法国以及犹太身份的重要性

阿伦特和她的母亲先是在日内瓦避难,但是后来玛尔塔决定回到哥尼斯堡,与她的丈夫呆在一起。阿伦特动身去巴黎,与她的丈夫君特·斯特恩会合。她为他带去了他的一部关于法西斯的讽刺作品的手稿,这部手稿在他逃离柏林的时候不得被遗留下来。据传它有一股腊肉的味道,因为它曾经被裹在一块布里同熏制过的腊肉放在一起(May 39)。1933至1936年在巴黎停留的这段期间,阿伦特和斯特恩仍然生活在一起,并且和共同的朋友进行社会交际,阿伦特也为了公共交往的方便继续用斯特恩这个姓。然而,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没有恢复,斯特恩在1936年移民美国,他们于1937年正式离婚。

阿伦特继续留在巴黎,她决定从事政治工作,以帮助犹太人民。她向布鲁门菲尔德学习,在一个“有社会抱负的新贵(socially ambitious parvenu)”和一个“有政治意识的贱民(politically conscious pariah)”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她意识到,她所面临的选择只有或者被德国文化所同化,或者作一个社会的局外人。她认定,前一种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幻想,重要的是有意识地作一个局外人(扬·布鲁厄尔 102-122)。阿伦特在巴黎所做的工作允许她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贱民而生活。

阿伦特先是为农业与手工业(Agriculture et Artisanat)——一个训练年轻的犹太人,为移民巴勒斯坦做准备的组织——做秘书工作。当在这个组织的工作结束时,她又在青

年犹太人大迁徙 (Youth Aliyah)——致力于向巴勒斯坦输送犹太儿童的另一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除了制定为这些儿童提供他们将来在巴勒斯坦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的那些训练计划外,她还帮助他们解决由反犹太主义以及他们的政治和个人身份上的模棱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在 1935 年,她带领一队儿童游览了海法 (Haifa), 并借此机会拜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遗址。这次旅行激发了她对于新近在巴勒斯坦出现的犹太社区的忠诚,但是她同时也开始担心,在其中所显现的一股犹太民族主义思潮有可能会毁掉这场政治试验中最美好的东西。

在巴黎的这段期间,阿伦特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友谊。她结识了诗人兼剧作家伯特olt·布雷希特 (Bertolt Brecht) 以及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Jean Paul Sartre)。安妮·门德尔松 (Anne Mendelssohn)——她在哥尼斯堡青年时代的一个伙伴——与她的丈夫埃里克·魏尔 (Eric Weil) 当时也在巴黎,门德尔松和阿伦特重新开始了她们的友谊。阿伦特还结识了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他也是一名犹太知识分子,他的友谊对于她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当最终离开巴黎的时候,她随身携带了他的部分手稿,以便将它们交给那些业已前往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和斯特恩一样,本雅明也曾经由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受到阿多诺的指责。然而,最终阿伦特将本雅明的手稿托付给阿多诺来出版。她还写了一篇绝妙的论本雅明的短文,收录在《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 这本书里。

海因里希·布吕歇尔 (Heinrich Blücher) 是阿伦特在巴黎结识的最重要的人物。布吕歇尔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于 1934

年逃离柏林。他较阿伦特年长，曾经是斯巴达克同盟的一名成员——该组织由罗莎·卢森堡所领导。他是这个组织中最早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之一，并且有较长的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他所获得的教育并不系统，但是他先后尝试了歌曲创作、电影评论和心理学研究这些行当。他不是犹太人。阿伦特与布吕歇尔于1936年在一次演讲中相遇，他们很快就生活在一起。

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朋友圈子，并且将他们的家作为会谈和思想交流的场所。这成为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们之间关系的特征，无论住在哪里，他们都要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这些人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们的家中，交流思想，相互辩诘，以期对问题思考得更为深入。

巴黎生活的这股生气勃勃很快就沉寂下来。1939年4月，阿伦特的母亲意识到，是她该离开德国的时候了。她来到巴黎，同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住在一起。她刚到后不久，布吕歇尔作为一个德国大男人夹在她俩中间，感觉颇不自在。当他最终对此习惯时，阿伦特的母亲鼓励他们结婚，尽管她并不像喜欢斯特恩那样喜欢布吕歇尔。她相信，一旦结婚，他们就更有把握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在这一点上，她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于1940年成婚，这段婚姻一直保持到1970年布吕歇尔去世。

婚礼在1月份举行，但是他们于同年5月就被双双送进临时集中营（internment camps）。阿伦特被送往戈斯（Gurs），但是她很快就在6月份得到了获释文件。朋友们为她在芒陶贝（Montauban）提供了庇护所，但是她一直没有布吕歇尔的任何消息，直到后来有一天他们在大街上偶然相遇。与她一样，

他也是在法国落入德国人之手时从一个临时集中营里被放出来的。玛尔塔·贝尔瓦尔德设法与他们会合,三个人开始一起努力,以获得赴美签证。得到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君特·斯特恩的襄助,使得这一过程变得相对容易。最终,阿伦特和布吕歇尔顺利地获得了签证,而玛尔塔·贝尔瓦尔德的签证则被延期了。当离境许可政策出现松动时,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决定先她前往里斯本。他们在那里一直呆了3个月,才得以乘船前往纽约。玛尔塔·贝尔瓦尔德则设法脱身,并且在仅仅3个星期之后也乘船离开。

阿伦特的朋友瓦尔特·本雅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有一个前往美国的紧急离境签证,由那些已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担保,他还拥有一个西班牙的过境许可,因此决定从西班牙离境。然而,当他到达边境时,他的过境许可没有得到承认,并且被勒令返回。当晚,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边境官员准许他的同伴们于第二天离境。由阿伦特带往美国的手稿成了本雅明最后的著作。在里斯本候船的时候,他们阅读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专题(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阿伦特后来专门写了首诗纪念本雅明:

有时,黄昏会再度降临  
夜幕从星空垂落  
我们放下张开的双臂  
在近处,在远方

黑暗中轻轻地传来  
古老的小乐曲,凝神聆听——



让我们抛却杂念  
让我们最终散去

远处乐声缭绕，四下哀伤笼罩  
是那乐声，还有这些亡者  
被我们作为信使遣去的这些亡者  
在前方引领我们安然入睡。（扬 - 布鲁厄尔 163）

## 在美国重新开始

1941年5月，阿伦特和布吕歇尔移民到纽约。他们在西95大街租了一座房子里的两个房间，当玛尔塔·贝尔瓦尔德来到的时候，他们为她提供了其中的一间。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

### 用英语交流

一到美国，她就将本雅明的手稿带给阿多诺，后者同其他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已经在纽约建立了新社会研究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这些手稿最终将显示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在一开始，阿多诺并没有妥善地处理它们，阿伦特曾后悔自己将它们交给了他。

对于阿伦特而言，这时候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学习英语。她的母亲曾经提醒过她，在哥尼斯堡，她应该学习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不是英语。现在，她将不得不学习英语了。阿伦特被马萨诸塞的一个家庭所接纳，并且很快就开始显现出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她原打算在那里呆两个月，但是后